

文化猎疑

金克木著

WEN HUA

LIE YI



文化猎疑

金克木 著

3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周宇芬
封面设计 麦荣邦

文化猎疑

金克木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江苏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江苏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字数：85000
印数：1—3000

ISBN 7-5426-0478-3/G·72

定价：2.50元

作者前记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常想到所谓“文化”的问题。

两种文化相撞不但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而且是中国现实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处在这问题中已经100多年了。问题不是新的，也不是旧的，旧问题不断出新花样。

我在《文化的解说》(北京三联书店版)小册子中曾试探从一个新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写这书以后3年多来又写了一些文章。现在先辑出这12篇，仍然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继续探索。

我越来越觉得，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遇时的变化中主体的选择性是首要的。这是由承受外来文化的一方的内部决定的。这内部倾向又是由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习惯决定的。中国、印度、日本同在19世纪中叶(1840年中国，1853年日本，1857年印度)受到由英美带头的欧洲19世纪文化的猛烈冲击，但后来的演变三国却迥然不同。印度读书人接触欧洲文化，直接读

英文书不用翻译。不会英文以及连本国拼音文字也不认识的人虽占人口大多数却被排斥在外。他们只见火车跑，不知它怎么跑和为什么跑，照旧遵循着千百年来思想和行为的习惯道路过日子。日本武士、志士开始学欧洲文化时曾利用中国翻译的汉文书，以后才自己大量翻译，同时强迫全国人接受基础教育，消灭文盲，使大多数人能够接触外来文化。中国人得到欧洲的书后，立刻按照一千几百年以来的传统习惯由一人口授一人笔记翻译出来。这些称为“格致”的科技新书使能读汉文的日本人受益，中国人的大多数仍旧不识字或识字而不读这些书，把洋书和洋枪、洋炮、洋烟(鸦片和纸烟)、洋船(轮船)、洋教(基督教)、洋油(煤油)、洋火(火柴)等等一概当作“洋鬼子”的“洋货”，又要用，又憎恨。对中、印、日三国来说，外来的文化是一样的，而且都是用大炮轰进来的，接触者的心理倾向，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倾向，却各有不同。这大多数人和只占少数的读书人不同，但又不能截然分开。文化并不专属于知书识字的。不读书本的自认没有“文化”，其实在文化中地位也许更重要。离开这些人的思想行为习惯倾向去谈文化，在文盲极少的现代日本或者还有点根据，在中国和印度都不见得符合实际的全貌，因而对变化很难看出苗头，也难以解说结果。挨打时的自然反应不会每个人一样。要解释和预测，知道了打人者还得着重了解挨打的本

人。为什么《巴黎茶花女遗事》会在本世纪初中国受到那么大的欢迎呢？这难道不需要从中国接受者方面考察吗？

这里的文章很单薄，够不上“深厚的解说”（thick interpretation）。这些都不是结论的推演，而是问题的追索，所以题名“猎疑”。我在《文化的解说》中提到过用符号学的眼光考察问题。这并不是说我做的就是符号学的（semiotic）研究。不过，着眼于“对话”、“通讯”或信息交流（communication），从文化符号探索其意义而作解说，确是我经常想到的。而且，看到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分别“构造性的”或音位学式的（emic）和“非构造性的”或语音学式的（etic）不同，也是我所注意的。喜资料而轻探索，喜笼统而轻分析，喜答案而轻问题，好学而轻问，好研而轻究，如果这些是我们常有的倾向，我确是想将轻的加重。这不是说原来重的不对，而是觉得不应偏重。

希望这些小文的集结出版能引起读者去追索一些文化疑问。

金克木

1990年8月

目 录

1	作者前记
1	我们的文化难题
6	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 ——读《史记·货殖列传》
26	从《三寸金莲》谈“挖根”小说
37	玉梨魂不散 金锁记重来 ——谈历史的荒诞
53	高鹗的八股文
61	爱是不存在的 ——关于19世纪俄国小说的对话
73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关于19世纪法国小说的对话
86	有情争似无情好 ——关于19世纪英国小说的对话
100	试论近代英印冲突的政治文化意义
125	东方美学或比较美学的试想
134	东方美学研究末议
143	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思想

我们的文化难题

当前中外文化互相冲击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因为10亿人口大国的文化不能不影响世界。单从中国方面说，就科学和哲学思想的范围内，我们遇到的是什么难题？换句话说，历史给我们出下了什么文化难题？

先得说清楚：科学指的是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来的近代科学，不是指一般的科学。这一点认识对我们很要紧，因为中国缺的恰恰是近代这一段的发展。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并不弱于欧洲。正在欧洲开始前进的关头，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利玛窦等人带来的还是近代以前的科学，同中国的可以合流。可惜没有合成更没有发展。这正在明清之际。这时和以后的欧洲近代科学直到19世纪后半才打进中国来，而我们自己在这段期间没有和欧洲作同步发展，没有伽利略上斜塔作实验，也没有烧死布鲁诺。一方面，中国的古代科学是不知怎么流出去的。另一方面，欧洲近代科学以前的结尾是和宗教同来的，这以后的发展又是和枪炮同来的。科学的同伴使中国人厌恶。中国科学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从16

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仿佛断了气（试看《畴人传》，不是全断，是对欧洲说）。直到20世纪初期，五四运动时提出要科学，还是含含糊糊的，不离其同伴和“富强”二字的，还没有接上气。一边全是欧洲的，一边仍旧是中国老式思想方法，两下不接头，使我们吃了大苦头。

近代科学在欧洲一开头被基督教教会认为有害。当时人还不明白科学和信仰是两回事。宗教改革并不需要科学指导。真正受到科学震动的是哲学传统。神学的破坏不是来自外部的科学而是来自内部的哲学发展。布鲁诺之死主要不是由于天文学而是由于他的怀疑论。哲学冲击了神学又受到科学冲击。科学先名为自然哲学，发展为另一种哲学。开头仿佛相安无事。哲学家康德也研究科学。哲学家照旧自高自大，并没有觉得自从康德的“超越”形而上学开始，就是哲学受科学冲击而变样了。欧洲从此发展出近代哲学。这正是在18世纪，中国的清代前期。中国的哲学本来也是不弱于欧洲的，缺的刚好是欧洲17到18世纪的一群哲学家。那时是明末清初，中国哲学家全忙于政治，讲哲学也是讲政治。同时，欧洲哲学家，培根、洛克、笛卡儿、狄德罗等许多人虽不脱离政治，却开辟了文艺复兴反中世纪以后的近代哲学道路。到19世纪末期，生物学的进化论冲击了整个思想领域，狄尔泰才从哲学上发展了原来解说经典的诠释学，提出“精神科学”，认为人文科学的

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同时，从尼采开始又有另一种思想向“形而上学”开火。在近代科学冲击下的欧洲哲学本身的一再大变化中，出现了从古未有的一些问题，成为整个20世纪欧洲思想中种种复杂变化的引子。不幸的是欧洲近代哲学也和近代科学一样在19世纪末期随枪炮、鸦片、机器等洋货一同拥进中国。这比科学进来的情况更麻烦，因为哲学思想没有通用的教科书和数学公式，又不能由人作实验，几乎不可能很快分出青红皂白。这个近代哲学的不接头使我们吃的苦头比科学方面更大，还苦的是自己不大觉得。

在科学和哲学方面，中国从来不缺，也不弱。只是从明朝末叶即17世纪起和欧洲对不上头了。当然这以前彼此也不一样，但难分轩輊；可是这以后中国就有点相形见绌了。这也不要紧。困难在于我们不能像印度和日本那样全部移植而和原有的来个“双轨制”。不论那样是好是坏，中国办不到。中国从周秦以来便是习惯于大一统的。这是从上到下根深蒂固的中国特有的思想，只能枝节修改，很难根本动摇，更谈不到拔除。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不亡之道。

困难还在于我们在20世纪初必须把欧洲从17世纪以来300多年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照19世纪末的样子一下子吃进来消化掉。用从语言学发展出来的术语说，那便好像是要把“历时的”转变为“共时的”。我们既要明白“属内”的，构造性的(emic)，

又要明白“属外的”，非构造性的(etic)。不同的东西同时来，挤进自己原有的“参照系”，真不容易消化吸收。

1858年印度次大陆全部沦为殖民地，到1947年才独立。1868年日本“维新”以后发展成为“大国”，先是军事的，后是经济的。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对外对内战争连绵不断，文化也走了第三条路，未亡也未兴。这不是因为中国本来弱，而是因为中国本来强。弱比强容易变，不是倒下去，便是站起来。强的变弱了，就倒不下也站不起。要再强起来只有靠自己内部化出新的力量，外力帮不上多少忙。这又是一个难题。

中外文化互相冲击，我们需要关心一下当前世界思潮中的问题，并且参加进去对话。不是只提供情况和资料，不是只说自己的意见，而是对话，以平等的地位，不高也不低，参加到世界思潮中去。这样的对话需要知己知彼，互相沟通。科学大致已经通上气了，可是科学思想却未必。这也就是哲学思想。已经通上气的哲学只限于大学教室中讲述的和少数专门学者研究的范围，也还不全面。至于科学和哲学通气的思想难题，重点不在本体论而在方法论方面，恐怕还需要真正切实沟通一下。例如眼前弥漫于许多学科中的用于方法论的思想，如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格式塔心理学等，我们还注意得很不够，还拘泥于旧的分类分科。若是通了气，不仅科学，连哲学

也参加到世界思潮中去，平等相待，不是摇头晃脑的轻视，不是手忙脚乱的引进，那难题也就不难解决了吧！

（原载《读书》1987年第10期）

范蠡 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

——读《史记·货殖列传》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跑得快，跑得快。
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
真奇怪，真奇怪。

——儿歌

○：怎么你忽然看起《史记·货殖列传》来？
对于经济感到兴趣了吗？

□：中国古时说“经济”是指政治，是“经国济民”。“货殖”指经商，只是现在所说的经济的一部分。现在的“经济”这个词是输出到日本又返销回来的新词，意义变了。我感到兴趣的只是一些空道理，可以勉强说是文化或则哲学。不过这两个词现在都没有公认的确切意义范围，不便引用。用个新词作比方，就说是“软件”吧。有些问题不妨彼此问答，进行一番思考。书中说的话算是第三者的，要我们译解。当然还可以有别的译法。

○：先提问题吧，没有问题，怎么思考？

□：好。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才编写一篇《货殖列传》，以下便是《太史公自序》了。《自序》中说《货殖列传》是讲的“布衣匹夫之人”的事，放在“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各列传之后。这是由于汉代抑商吧？“货殖”一词是出于《论语》中“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在这篇列传中，子贡名列第二，说是子贡经商发了财，他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见这和“儒”是大有关系的。孔子出名还有点靠了学生的经济地位哩。可是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引一段《老子》，这是为什么？是由于汉初崇黄老么？他又把子贡列为“榜眼”或“亚军”。是不是司马迁以为孔、老原来是，或则应当是一家呢？孔子、老子都不重商。司马迁这样做是为了“贴金”还是确有所见呢？《货殖列传》未必是司马迁的定稿，但是格局和意见以及大部分文章还应算在他的名下吧？

○：这不但是经济思想史，又追溯到哲学思想上去了。我想还是另起思路吧。就《货殖列传》说，司马迁排的名次是：第一名范蠡，第二名子贡，第三名白圭。这三位是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从猗顿到巴寡妇便是单纯致富的工商业者了。“汉兴”以下才是论当代经济。为什么范蠡第一、子贡第二，这是政治经济合一么？

□：子贡在《论语》中地位不低，是“言语”科

的代表，外交家（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他到处得到国君分庭抗礼的接见，不是只凭讲话，还仗恃财力作外交后盾吧？虽然司马迁没有记他的经济理论，但他是孔门大弟子，他的思想大概不会离孔子本人的儒家学说太远吧？孔子在《论语》中曾批评弟子冉有（冉求）为鲁国大夫季孙氏“聚敛”财富，却只轻描淡写说子贡一句“赐不受命”，还夸他做生意“亿则屡中。”可见孔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货殖”，他反对的只是“聚敛”，即搜括老百姓。至于子贡做个体生意，又藉经济力量见国君活动政治，并为老师作宣传，孔子是不曾反对的。孔子还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他不反对发财。这是只依据《论语》一部书，不是出于各家书中不同说法，所以应当是合理的。

○：子贡本人的经济理论既然没有说出来，不便以各种各样的儒家理论去揣测，那还是先考察一下“状元”或则“冠军”范蠡吧。

□：我想不如先看看第三名白圭说些什么。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司马迁总结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原来这位第三名“探花”还是讲经济学的祖师爷。太史公把他和李克（李悝）对比说：“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这明显是两种经济思想。李克是给魏文侯致国家富强的。伊尹、

吕尚(姜太公)是商、周开国的大政治家。孙臏、吴起是战国的大军事家。商鞅是使秦国变法富强的。白圭竟然以这些人自比，而且提出：智、勇、仁、强四者水平不够的人“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录取学生的标准还很高。为什么这位祖师名列第三，而李克、商鞅不列入这一篇里呢？

○：听听你的解说。

□：司马迁在引《老子》的语录以后发了一段议论作为引言。其中首先引姜太公(吕尚)如何发展齐国的经济，齐国衰落时又有管仲发展经济，使齐桓公当上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以下才排列传记，照《自序》说的，只列“布衣匹夫”。以范蠡居首，是说他在使越国称霸以后化名鸱夷子皮和陶朱公经商致富，是商人身份。子贡居次，也只算他是大商人。白圭第三，他是缺事迹而有理论的平民。叙述范蠡时引了他的老师计然的理论。接着说范蠡成功以后“喟然叹曰：计然之策七(《汉书》作“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泛于江湖，变名易姓。”这正好和白圭的话互相照应：治国家经济，使国家富强，和个人发家致富是一个道理；治国、用兵、行法，是一个道理。道理的原则是计然、白圭说的，来源则是篇首引的《老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不是现在通行的《老子》的摘录，甚至可以说是和通行本中的话大不相同。其中末尾两句之下便是“太史公曰”，可见这两句仍然是《老

子》的。至少是司马迁所解说的《老子》的。照这段话看，《老子》虽然说“老死不相往来”是“至治之极”，但末两句话说，在“晚近”（即当时）是“几无行矣”，即行不通了。由此才有“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工商业是不可废的。接下专讲计然、白圭的理论，范蠡、子贡的实践，以至当时（汉代）“都会”（商业大城市）和富人（工商业者）的情况，都顺理成章了。

○：可是这样一来，范蠡的一生便被割裂了。一半是治国，在《越王勾践世家》里，一半是治家，在《货殖列传》里。前一部分中又有治家的一个故事，还是要合起来看才能通气。前半是传，后半仿佛是专题提要。合起来就不必再查对《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了。至于范蠡、鸱夷子皮、陶朱公是不是一个人，是真事，或则是传说，若不考证历史，那也无关紧要。这是个理想人物，是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又会经商，是个交游广阔，到处为家，又不露面的大商人。这不是和《老子》以至《庄子》中的“人”的理想相似而且也不同孔子门徒子贡仿佛么？可惜现在有的电影、电视剧描写吴越之争，强调西施美人计，把范蠡变成另一种人了。也不知是美化还是丑化，总之是“大变活人”，换了一个。怎么才能宣传一下古文献中的（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的）范蠡呢？看来他是张良、诸葛亮之前的一个文武全才又能进能退的